

从雾到火：历史深处的成都平原

——论《崇宁破晓》的史诗性、民俗性与当代性

□ 黎正明

四川作家周树安的《崇宁破晓》(河北文化音像出版社 2025年6月第一版),是一部以成都平原1950年代“和平解放”为背景的纪实性长篇小说。小说以“雾”起笔,以“火”收束。从江家桥头的浓雾中走来的,不只是几个解放军战士,更是整个川西平原在旧秩序崩塌与新秩序建立之间的剧烈阵痛。作品以崇宁县(今分属郫都区、彭州市、都江堰市)为原点,展开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征粮工作队被围杀、土匪暴乱、公审枪决、百姓惊惧、烈士安葬、武工队剿匪……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历史小说”,而是一部以地方性知识、民俗记忆与民间伦理为根基的“新史诗”。

一、史诗性：地方史的“微观总体叙事”

从“雾”到“火”的结构隐喻。小说以“雾”开篇,象征旧世界的模糊、混沌与不安;以“火把场”“贴门神”“守岁”等川西年俗为过渡,最终以“枪毙土匪”“公审大会”为高潮,完成了从“自然迷雾”到“政治火光”的象征转换。这种结构并非简单的线性叙事,而是一种“微观总体叙事”——通过一个县、一个乡、一座桥、一个粪坑的极端事件,折射出整个川西平原在国家转型期的巨大震荡。

多声部叙事的复调结构。小说采用“多视角+多声部”的叙事策略:解放军、土匪、农民、地主、妇女、保长、参议员、和尚、烟农……每一个人物都带着自己的立场、语言、记忆登场。尤其是周继红、李德茹、张老三、江麻头儿等人物,并非简单的“正面”或“反面”,而是在时代夹缝中挣扎的“中间人”。这种复调结构打破了传统革命叙事的二元对立,呈现出一种“人民内部的复杂性”。

地方性史诗的“非英雄”视角。与传统史诗中的“英雄”不同,《崇宁破晓》的主角是“地方”本身:江家桥、法华寺、徐堰河、留莺街、平乐寺……这些地理空间不仅是事件发生的场所,更是历史记忆的载体。小说通过反复书写“走路”“过河”“翻墙”“逃命”“埋人”等动作,构建出一种“地理、身体、命运”三位一体的史诗感。正如段振声之死,不是“牺牲”,而是“被扔进了徐堰河”,这种“非英雄化”的死亡叙事,反而更贴近历史的真实。

二、民俗性：川西平原的“百科全书式”书写

年俗、饮食、方言的“物质性叙事”。

小说对川西民俗的描写并非点缀,而是推动叙事的核心动力。腊月三十“赶火把场”、除夕“贴门神”、“初一吃汤圆”、“初二回娘家”、“雨水节送罐罐肉”……这些节俗不仅是时间标记,更是政治事件的民间转译。例如,土匪选择腊月二十五暴动,正是因为“年关”是百姓最恐惧、最脆弱的时刻;而刘绍成选择在正月初一“朝山拜佛”,则是对民俗的“征用”与“重塑”。

小说的饮食描写更是细致入微:酥肉、回锅肉、醪糟粉子、郫县豆瓣、腊肉、汤圆芯子、烟丝、叶子烟……这些不仅是味觉记忆,更是阶层、身份与关系的象征。例如,李德茹用“金钩儿钱”给周继红刮痧,不仅是医疗行为,更是显示夫妻情感的民间仪式。

方言与语言的“声音考古学”。小说大量使用川西方言:“啥子”“耙和”“屙屎”“操社会”“整烟”“扯筋割孽”……这些语言不仅是地域标识,更是人物性格与阶级身份的“声音指纹”。例如,张济川的语言充满袍哥黑话与暴力威胁,而周继红则逐渐从“乡丁”语言转向“军代表”语言,这种语言的政治化过程,正是人物命运转变的隐性线索。

民间信仰与宗教空间的“政治转喻”。法华寺、平乐寺、地藏王菩萨、严君平墓、洗心池……这些宗教空间在小说中被赋予了政治转喻功能。法华寺从“乡公所”变成“杀人场”,平乐寺从“求学圣地”变成“避难所”,严君平墓从“文化象征”变成“许愿圣地”……这种神圣空间的世俗化与政治化,正是川西社会在1950年“换人间”的微观写照。

三、史料性：被遮蔽的“二五叛乱”与地方记忆

与档案互文的“非虚构写作”。小说中大量事件可与成都市档案馆“二五叛乱”档案互证:龙潭寺惨案、朱向离被杀、崇宁县段振声牺牲、柴和祥被辱杀……小说通过“张三伯儿报信”“耿三娃儿补枪”“杨保长埋尸”等细节,还原了档案中无法呈现的民间视角。

“土匪”的多重身份与历史复杂性。小说中的“土匪”并非单一身份,而是多重角色的复合体:一是政治土匪:如谢麒麟、刘俊华,是国民党残余与地方势力的合谋;二是经济土匪:如张济川,是地主武装与保甲制度的延伸;三是伦理土匪:如江麻头儿,是民间暴力与“替天行道”传统的混合;四是被迫土匪:如李德全、张老五,是“被裹挟的农民”。

一场百年酒城往事的缩影

——读田积小说《秋露白》

□ 张 蓉

多年以来,泸州老窖在酿造美酒的同时,也酿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老窖公司总经办青年作家田积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秋露白》正是其中的一部。悠久的窖池酿造醇香的美酒,悠长的日子酿造五味的生活。秋露白,既是一款酒的名字,也是一种人生的感悟。梦幻、神秘、若有若无的香,如梦如幻的迷离。好酒,多元的世界,复杂的感情,不一样的审美和文化风情,余味悠长。

品味《秋露白》语言风格,揣摩其情节走向,就会发现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有深度的故事,有立体的人物形象设计,有不断转折的情节,赋予了小说曲折引人的魅力。

叙写深厚的酒文化和斑斓的川江文化。作者把小说的背景定格在泸州,大胆选用在泸州叱咤风云的军旅人物来展开传奇,触碰那段复杂奇幻的历史,这是需要勇气的。但作者没有离开泸州的川江壮阔、美酒醇香,让读者在回味美酒中引发对酒城的探索之趣,超脱了一般性的颂歌直白,增添了文章奇趣。

慨叹复杂的人性和人性中的挣扎浮沉。小说中的“我”和吴阿婆,阿婆都不是那种顺从命运安排的“棋子”,却又无从摆脱时代轱辘的碾磨,这使

得“我”一再耽于人际关系的枷锁,却又不断寻找生命绽放的原野,于是有了与百年历史擦肩的机会,揭开沉痛岁月里血淋淋的伤,探悉一个个令人咋舌的过往,直面过往时代光怪陆离的棱镜,探寻复杂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以及那些在人性善恶和利益关系中的取舍沉浮。作者显然充分认识到,这个世界充满悖论。人生就是一部传奇。无数个偶然形成必然。无常是生命的常态,但命运的轨迹又和个人的性格息息相关。小说是生活的哲学,透过现象看本质是哲学的本来要义。于是作者在情节设计、细节考虑中,都体现了这样的思考和感悟。比如,作者对人物的取名就很有寓意:吴疾其人并非“无疾”反而身体瘦弱,吴争并非“无争”反而喜欢争斗,吴香并非“无趣”相反美丽多“味”,自带香味,其人生也充满曲折传奇。吴森是道士,受到道德高僧熏陶,最该得道悟道,清心寡欲,却演绎了荒唐而戏剧性的人生。机缘巧合下,道士成为执掌一方的军官、统帅,在酒城修路、办实业、惩凶顽、建酒庐,且娶了几房姨太太,过起荒淫无度的日子,既有血性抗日的壮举,也有打击地下党人的顽愚,最后落得败亡台岛,皈依于道观,反思其一生。

录载生命的激情和命运的漂泊坎坷。

这种土匪的身份,打破了“匪即恶”的简化叙事,呈现出国家转型期基层社会的撕裂与重构。

烈士与百姓之间的记忆裂缝。小说最令人震撼之处,在于对烈士与百姓之间关系的冷峻描写。段振声、周俊英等人并非被“敌人”杀死,而是被自己试图解放的“人民”杀死。这种“人民内部的暴力”,是新中国初期难以言说的历史创伤。小说通过“野狗啃尸”“无人敢收尸”“土匪割头”等细节,将“烈士”从神坛拉回人间,呈现出一种“反纪念碑性”的史料价值。

四、当代性：革命叙事如何“地方化”

对“革命历史题材”的法魅与重构。在当代“红色叙事”日益符号化的语境下,《崇宁破晓》提供了一种“法魅化”的革命叙事:它不再歌颂“胜利”,而是凝视“代价”;不再塑造“英雄”,而是追问“为什么有人成了土匪”;不再强调“觉醒”,而是呈现“混沌”。这种“反史诗的史诗”,正是对当代主旋律叙事的深度解构与情感重塑。

“地方性知识”作为抵抗遗忘的方式。小说通过“鸡公车”“烘笼儿”“扯痧”“烟丝”“鸡肠子路”等细节,构建出一种“川西平原的感官记忆”。这种记忆不是“国家记忆”的注脚,而是“抵抗遗忘的民间方式”。在当代城市化、标准化、全球化的浪潮中,这些“地方性知识”成为文化认同的最后堡垒。

“武工队”与“乡贤”的当代隐喻。小说中“武工队”的成立,依赖于刘绍成、周继红等“乡贤”与“新政权”的合作。这种“地方精英-国家权力”的互动模式,在当代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中依然具有隐喻意义:如何在不断撕裂乡土伦理的前提下,完成现代国家的基层建设?《崇宁破晓》没有给出答案,但提出了问题。

《崇宁破晓》是一部被浓雾笼罩的火之书。它写“火”,却不歌颂火;它写“雾”,却不逃避雾。它以川西平原为舞台,以民俗为语法,以史料为骨骼,以人性为血肉,构建出一种“地方性的总体叙事”。

在今天,当我们再次站在江家桥头,或许已看不见浓雾,也听不见枪声。但只要我们还记得“腊月二十五”“赶火把场”“扯痧”“送罐罐肉”,那些被历史碾过的人与事,就仍在方言、饮食、仪式与沉默中活着。正如小说中,李德茹背着孩子,望着母亲远去的背影——那不是悲剧的终点,而是民间历史继续生长的起点。

小说的精彩正在于作品展示的爱与恨,仇与情,令人欣赏的种种个性,一个个故事展示的生命的热情。书中的“我”,吴香,江中月、东方白,包括司马醇、图索骥,都在一定时期、一定背景下遵从内心的呼唤,追寻爱恨与苦乐人生。为了心中所愿,有人丧生在灾厄之中,有人血洒江天,有的人隐姓埋名,追悔一生。

在离开酒城的头一天晚上,请吴香两人到江中饮酒。在欣赏完江中水母的表演后,他们举杯痛饮。吴香将准备好的“媚人丸”投入两人的酒中,却不想自己也喝了有药的酒。吴香将两人关在船舱中,自己跳入水中,等清醒后,她将船划到江边,开始了自己的逃亡之路。刁蛮任性的吴香遇难呈祥,被救后凭着“读心术”,抓获日本间谍,帮助友人下媚药却意外改写自己命运。叶舟和江里浪一起办漕运公司、修漕院,参加抗战,为筹集资金,在乱世中得显身手,获利甚多支持川军抗战,惋惜地是后来被批斗,江里浪死在红卫兵脚下,叶舟成了疯子。司马醇扩办南城酒坊,建烈性酒工厂,酿制“陈醇秋露白”,可惜爱情失意,在迷茫与寻觅、美好与悔恨之中,度过孤独寂寥的一生。佛教强调人“生而实苦”,命理劫的漂泊坎坷确实是离乱年代的常态,作者写出的应是看似荒谬、实则发人深省的社会百态。

黎阳在诗坛几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就我对他作品的阅读来看,应该说风格几经变化,诗艺探索一直未停止。他的诗歌以其独特的艺术构思、出人意表的意象选择、凝练含蓄的抒情、对古典诗艺的热衷和主动靠拢,以及深刻的思想内涵,在当代诗坛上是一个较为注目的存在。就他的新诗集《西岭笔录》而言,这是他诗歌创作和诗学实践的最新成果,凝聚着他无数的心血。这部诗集不仅具有浓郁的抒情的古典的气息,更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时间、人生、自然、历史的深刻思考和感悟。下面是笔者读黎阳诗集《西岭笔录》的几点心得。

一、山河录中的历史回响

“山河录”中的诗歌作品,以金河口、大渡河、蓑衣岭、贺兰山、莫高窟、川西坝、峨眉、沱江石佛等地标为线索,串起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与人文风情图。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和深沉的情感,将读者带入了一个既遥远又熟悉的世界,让人在品味诗歌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魅力。诗歌开篇,作者带领我们走进了金河口,这里的三线工作旧址成为了历史的见证。红色的方砖、高悬的灯光、跳跃的身影,这些细节的描绘不仅还原了当时的生活场景,也传递出了一种对于青春和奉献的怀念与赞美。金河口镶嵌在大渡河岸,但也是黎阳诗歌中的地标。这里的每一个元素,都仿佛在诉说着一段段关于奋斗与牺牲的故事。

在蓑衣岭,作者用更加深情的笔触描绘了那些为筑路救国而付出生命的工人们。他们的身影在飘荡,劳动号子在呼号,静默的石碾在崎岖中挺起。这些画面不仅让人感受到了工人们的艰辛与坚韧,也让人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而那些倒在路上的工人们,更是成为了风雨中无字的碑文,他们的生命虽然逝去,但他们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在贺兰山,作者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对历史和文化的敬畏。那些被雕刻的记忆、裸露的脱落的石粉、山岩上的图腾,都在告诉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故事。而莫高窟的壁画则更是将我们带入了一个神秘而神圣的世界。那些仙佛的神情、经书的不语、彩墨的有言,都在向我们诉说着关于信仰与艺术的奥秘。川西坝上的民居、大邑的稻田渔歌、峨眉的云雾和雨水、沱江石佛的庄重与神圣,这些时空断片在诗歌中交织成一幅幅美丽的画面。这些画面不仅展示了川西地区的自然风光和人文特色,也传达了作者对于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和对于生活的热爱。总的来说,“山河录”这一辑的作品充满厚重的历史感和浓浓诗情。它通过对于自然风光的描绘、历史事件的回顾以及人物形象的诗意刻画,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美丽与神秘,也可以感受到人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对于信仰的坚守,同时,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魅力。在品味诗歌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可以得到美的享受,也可以得到精神的洗礼和思想的启迪。

二、草木篇里的人生沉思

在纷繁复杂的文学世界中,每一篇作品都是作者心灵深处的呐喊与倾诉。《西岭笔录》中“草木篇”以其独特的草木意象和深沉的人生感悟,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幅生动而富有哲理的画面。在阅读这些作品的过程中,我仿佛跟随作者的笔触,穿越历史的长河,品味着岁月的甘醇,感受着生命的律动。

这部分作品意象考究,语言饱含诗意,引领读者进入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自然世界。在这里,草木不仅仅是自然界的生物,更是作者表达情感、传递思想的媒介。从“纸上一曲桃花水”到“一枚硕大精致的化石”,作者巧妙地运用草木、化石等意象,构建了一个充满诗意和哲理的艺术空间。桃花水、化石、天音、越剧青衣等元素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卷,让我们在欣赏语言艺术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作者对于生命和自然的敬畏与赞美。作者通过对草木的描绘,还为我们展现了江南水乡的独特风情。无论是“一杯茶里的江南吴语”,还是“西塘温软的水道上越剧青衣”,都让我们仿佛置身于那个烟雨蒙蒙、茶香四溢的世界。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江南水乡的美丽与宁静,这种情感与草木的意象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效果,让读者在品味文字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作者的情感世界。

“草木篇”除了对自然的描绘外,文本还深入探讨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但使情亲千里近”和“光阴的网,把思念的余温藏在鞋垫下”等句子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于亲情和思念的深刻体悟。作者通过细腻的描绘和深入的剖析,让我们感受到了人生中的温情与感动。同时,文本中对于游子情怀的描写也让人动容。游子远离故乡,背负着思念与牵挂,在陌生的城市中追寻着梦想与未来。这种情感与草木的意象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表达,让我们感受到作者作为游子内心的孤独与坚韧。此外,部分文本还通过对历史与文化的反思,展现了作者对于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深刻思考。从“南宋之后独特的标本”到“沿着西塘的口碑从嘉善不翼而飞”,作者带领我们穿越时空的隧道,回顾了人类历史的沧桑与变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作者对于历史的敬畏与尊重,也能体会到作者对于人类文明的深沉思考。

三、时光书中的人生赞歌

“时光书”中的作品大都与“时间”“感悟”

古典情味与诗音交响

——读黎阳诗集《西岭笔录》

□ 马迎春

相关。其中每一篇作品都如同一个独特的思想岛屿,承载着作者的思考与情感,引领读者穿梭于现实与想象之间。《北方以北》就是这样一篇充满魅力的作品,它以北方大地为背景,通过细腻的笔触和深情的诗句,描绘了诗人经历过的“北方场景”,展现了北方性格、北方命运与人性的光辉。作品的开篇便以过海关为界限,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充满地域特色的世界。在这里,人们吃着同一锅饭,说着相似的方言,即便存在方言的差异,也从未受到怠慢。这种简单而纯粹的生活方式,让人感受到了北方人的朴实与热情。而这种朴实与热情,正是作者想要传达的北方精神的核心。随着诗意的展开,作者进一步描绘了北方人的坚韧与美好品格。他们面对生活的艰辛与困苦,从不轻言放弃,而是选择默默地承受与努力。他们相信命运,但也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这种既认命又不屈不挠的精神,是北方人独有的品质,也是作品所要传达的重要主题之一。这种对生命的执着、坚韧与热爱,正是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此外,作品中还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营造了一种独特的美学氛围。无论是大雪纷飞的北方原野,还是炊烟袅袅的乡村小屋,都充满了诗意与画意。这些自然景物不仅为作品增添了美感,也象征着生命的顽强。

总之,“时光书”中的作品,有不少篇章深刻地探讨了命运、人性、亲情等永恒的话题。通过对这些话题的探讨,作品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无论命运如何无常,我们都应该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与向往;无论人性如何复杂,我们都应该坚守善良与真诚;无论亲情如何短暂,我们都应该珍惜与感恩。

四、穿云筒里的古典情味

在浩渺的文学长河中,诗歌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以其深邃的内涵和优美的韵律,流传千古,触动着人们的心灵。当我读到“穿云筒”中的诗歌文本时,尤其是第一篇《从尺八缝隙里听唐朝的吟诵声》,尺八的悠扬与唐诗的韵味融为一体,不禁为之动容,仿佛置身于一个穿越时空的诗歌盛宴中,与古代的文人墨客们共同领略那份深沉而悠远的文化韵味。

尺八,作为一种古老的乐器,其音色独特,既能表现出深邃的哀愁,又能传达出高远的意境。在这篇诗歌文本中,尺八不再是一件简单的乐器,而是成为了一种穿越时空的媒介,将我们带入了唐朝那个诗意盎然的时代。通过尺八的吹奏,我们仿佛能够听到唐朝诗人们的吟诵声,感受到他们那种对人生、对自然的深刻洞察和无限热爱。可以展开想象,文中提及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唐代大诗人,他们的诗作在尺八的伴奏下,显得更加生动而富有感染力。李白的豪放不羁,杜甫的深沉厚重,白居易的平易近人,都在尺八的旋律中得到了完美的呈现。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不仅让我们对唐朝的诗歌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也让我们对尺八这种乐器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穿云筒”诗歌文本中还融入了许多对自然、人生和社会的深刻思考。文本中还通过描绘一些具体的场景和细节,如“红烛昏罗”、“独钓醒醒”等,营造出一种静谧而深沉的氛围,使得整个文本充满了诗意和韵味。同时,这些场景和细节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作者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深刻体验,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了文本所传达的思想和情感。

在文本的结构和语言表达上,整部诗集也展现出了不俗的艺术水准。文本结构紧凑,层次分明,应该说每一篇诗歌文本都紧扣每一辑设定的主题,四辑如同四个声部,相互呼应,形成了一种和谐而统一的艺术效果。同时,作者的语言表达也极具特色,既富有诗意又饱含哲理,让人在品味文字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作者的思想深度和文学素养。可以说《西岭笔录》真正体现了作为诗人的黎阳在语言运用上的高超技巧和深厚的功底。他善于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和意象,使得诗歌既具有音乐性又具有画面感。同时,他也注重语言的精炼和准确,使得每一个词语都能够恰到好处地表达出他想要表达的意思。

本版责编:张语婷